

世纪风铃——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

主 编◆汪信砚 副主编◆左汉平

胡象明 著

权力

老树新枝分外春。传统的学科，成熟的气度与年轻的思想从书页中迸发。以“读者”为本重新选择和组织知识，给人以生活和发展的智慧。

政 治 学 启 示 录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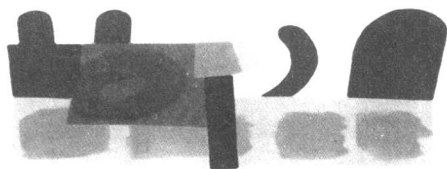


用

权力之用

政治学启示录

胡象明 著



世纪风铃——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之用:政治学启示录/胡象明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

(世纪风铃·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汪信砚主编)

ISBN 7-216-02473-7

I. 权…

II. 胡…

III. 领导学

IV. C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0441 号

权力之用——政治学启示录

胡象明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178 千字

插页:5

版次:199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640

定价:13.70 元

书号:ISBN 7-216-02473-7/C·127

序

当代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良好的教养，没有牢固的知识，没有丰富的智力素养和多方面的智力兴趣，要把一个人提高到道德尊严感的高度是不可思议的。”为此，他大力倡导文化素质教育，强调人们“应当特别重视那些培养人的灵魂、意识、情感和信念的知识”。苏霍姆林斯基对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视和强调是针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时代而言的，同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也具有极为显著的意义。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人类的生存境况极为尴尬的时代。借助于各种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当代人类从自然界攫取了不可胜数的资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过上了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富足而便利的物质生活。然而，当代人类并未由此进入理想中的极乐世界。与物质生活的富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冲突、宗教淡化、战争危险、热核威胁、技术异化以及人与人的疏离，使得当代人陷入了极度的精神困惑和迷惘之中。信仰危机、理想缺失、道德失范、自我感、意义感和归属感的丧失以及心态失衡、个性扭曲等等，已成为当代世界极其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正如一首诗所云：人们走入了手段的王国，却迷失了人的目

标;跨进了物质的天堂,却跌下了精神的深渊。对此,当代许多富有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思想家都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他们指出,如果不能克服这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二律背反、走出这种精神的深渊,人类终将失去做为人的尊严感,将会沦为“没有灵魂的机器”或“没有情欲的色鬼”;而要疗治当代人的心理疾患、帮助人们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必须借重于教育来重塑人的精神世界。用汤因比的话来说,就是要“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用池田大作的的话来说,就是要“寻求新的人性”,造就“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强的自制力”的新人。而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来说,则是要特别注意用“像文学、历史这些文科知识”“来充实人的灵魂”。上述这些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们可谓是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他们实际上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呼唤着对人的文化素质教育。

当代中国社会既面临着我们这个时代所共有的困扰,同时又内存着它自身所特有的问题。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步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途曲折多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步履维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民的文化素质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现代化建设要求人们具有很强的科学精神和法理意识,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却是文盲、科盲、法盲,满脑子充斥着家族裙带观念和小农意识;现代化建设呼唤着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但许多人却缺少起码的现代民主意识,或者认为政治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或者觉得民主纯粹是一种负担和累赘;现代化建设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激发了人们的欲望和期待,但不少人却权利意识强烈而责任和义务观念淡薄,如此等等。可以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途程中的每一步都受到了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羁绊和拖累。

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全面地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以确认个人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地位为前提、以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为内在运行机制,它为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创造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但同时也对人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个人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经济、法律和道义上的全部责任。然而,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得到它所要求于人们的相应文化素质的支撑,社会生活中原本已得到较充分表露的国民的文化素质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之间的不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得更加突出。今天,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相当一部分人中的行时走俏及其导致的物欲横流、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尔虞我诈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的商业化、浅表化和庸俗化,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们正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市场的正常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人们文化素质的低下却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个方面。有感于此,许多有识之士都振臂呼吁应该大力加强对国民特别是对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并迅速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和响应。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强化文化素质教育的问题被正式提上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的议事日程。

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乃在于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文化素质是一个标示人的内在世界的特性、状态和修养水平的总括性概念,它是人们通过对相关文化知识的学习、领悟和在特定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养成的内在品质或内在气质。大体上说,人的文化素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的思维能力,包括思维的开拓创新能力、认知判断能力、善恶辨识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二是人的精神境界,它是人的理想、信念、德性、意志、情感等精神要

素的总体发展状态和水平。人的文化素养就是其思维能力和精神境界的有机统一。由是观之,人们的文化素质状况也是一个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基本标志,而强化文化素质教育则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人的文化素质是可以借助于特定的学问来加以培养和提高的。伊斯巴哈尼曾说:“缺乏智慧的灵魂是僵死的灵魂,若以学问来加以充实,它就能恢复生气,犹如雨水浇灌荒芜的土地一样。”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学问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都具有同样的作用。对此,近代的弗兰西斯·培根就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他曾指出:“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学问变化气质’。……精神上的缺陷没有一种是不能由相当的学问来补救的。”在这里,培根在肯定人的文化素质的可塑性和学问对于人的文化素质培养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揭示了不同的学问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起着不同性质和类别的作用。当然,不同的学问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的作用的不同,不仅表现在其作用的性质和类别上,而且也表现在其作用的大小和方式上,也就是说,有的学问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的作用要显著一些,有的则不那么明显;有的学问对人的文化素质培养的作用要直接一些,有的则间接一些。应该说,在人类的科学文化体系中,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或学科对人的文化素质培养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这些学科凝聚着人类长期以来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表达了人类对于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德性、坚强的意志和美好的情感的无限珍重,体现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不息追求,记载了人类千百年来苦苦求索和守望精神家园的曲折心路历程,它们对于疗治现代社会的心理疾患、安抚现代人的灵魂和帮助人们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对于健全人们的心智、促进人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对于增强人们的思维能力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具有十

分直接而显著的作用。在当前的文化素质教育中,我们要特别重视这类与人的文化素质培养关系密切的学科。

人的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离不开对相关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无论是人的思维能力的增强还是精神境界的提高,都必须以相关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扩展为基础和前提。我们之所以说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就是因为它们蕴含着特别有助于增强人的思维能力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丰富知识。就此而言,强化文化素质教育,也就是要使人们获取多方面的文化知识,特别是使人们掌握那些对人的文化素质培养具有直接和显著作用的学科的丰富知识。但另一方面,人的文化素质并不归结为其所获得的知识,一个人拥有丰富的知识并不等于他必然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要有效地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不仅要使他们具备尽可能广博的相关文化知识,而且还应使其真正理解和领悟这些知识,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从而能够并善于运用这些知识。正如培根所说:“多诈的人藐视学问,愚鲁的人羡慕学问,聪明的人运用学问,因为学问本身并不教人如何用它们;这种运用之道乃是学问以外、学问以上的一种智能,是由观察体会才能得到的。”因此,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既要注意传授相关的文化知识,更要注意帮助人们深刻地领悟和自觉地运用这些知识,使其真正起到增强人们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的作用。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世纪风铃——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丛书在选题上侧重于与人的文化素质培养密切相关的一些学科,力求以一种轻松、活泼而又浸润着严肃思考的方式来阐释这些学科对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对人的自我完善和实际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着重在与人的素质培养的关系中发掘这些学科存在、发展的理由和根据,回答这些学科到底能给人们一些什么智慧或对人们有些什么启迪、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的

生存、活动和发展特别是对人的思维能力的增强和精神境界的提高能有什么用处或影响以及它们是怎样实现其作用和影响的等问题,其目的不在于向读者系统地介绍这些学科的知识,而是要为读者自觉地选择、接受和领悟这些学科的知识提供认识上的向导。丛书的编写无意于在学科知识这个静态的层面上去追求自身的完整性,而是始终坚持以读者这个活生生的对象的知识需求和阅读心理为内在的参照系,努力做到保持与读者进行开放式的对话和交流。丛书的作者都是其所涉学科领域中才华出众、很有造诣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丰富学识和辛勤劳作使得本丛书既具有很高的学术品位又充满了盎然的生气。

20 世纪即将逝去,21 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新的世纪包孕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它必将对人们的文化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亲爱的读者,愿我们这套丛书似世纪风铃,使你从中受到启迪,使你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使你能够以更加健全的心智从容自若地走入 21 世纪!

汪信砚

1998 年 10 月于武汉大学

引 言

公共权力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权力体系之中。不是你管他人,就是他人管你,管人的人也得服人管。任何人都无法避开这种特定的权力关系。这种特定的权力关系是社会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

自从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人就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类来到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群体之中,人类正是通过一个个的群体,使它获得了自然界其他任何动物都无法比拟的力量。关于这一点,我国古代的荀子早就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群体的存在表明组织的不可避免。由于有了组织,因而有了公共权力,有了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人类不仅仅是一种爱合群的动物,而且是一种爱思维的动物。人类对于其自身组织及其公共权力的思考,亦即对于政治的思考,通过长期的探索,便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亚里士多德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政治学。自从亚氏写作《政治学》一书以来,政治科学发展到今天,至少已有 2300 余年的历史。因此,政治学实际上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问。

然而,对于今天生活在中国大陆相当多的人来说,包括很大部分知识分子,他们虽然知道存在“政治”这样一个术语,但并不知道有一门政治科学。其实,这并不奇怪。自 50 年代初以来,由于“左”倾思潮占支配地位,我国的政治科学作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被赶出了科学的殿堂。直至 80 年代初政治科学的恢复,在我国学术界竟有 30 余年的历史没有政治科学的位置,在这期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中,几乎无人受过政治科学的教育。然而,这期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国又到处泛滥着所谓“政治挂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所有事业几乎都让位于所谓“政治工作”。其结果是,政治的含义被歪曲了,它成了“阶级斗争”的代名词;政治活动使人感到厌恶,它使一切有事业心的人避而远之。

其实,政治决不仅仅是阶级斗争,它有着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的含义。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孔子看来,政治是一种治国平天下

的道德规范。而韩非子则将政治之道归于法、术、势,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成了权力的获取、保持和运用。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直言不讳,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或者统治术。而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认为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的创立,为确立科学的政治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社会公共权力的存在是政治这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存在的前提,而社会全局利益总是政治追求的目标。政治不过是政治主体通过获取和运用公共权力来调控社会全局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社会存在就总会有某种公共权力,总会有某种社会全局利益,因而政治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①。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政治的产生、发展、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由于公共权力的运用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因此,政治学的研究总是要涉及到公共权力及其运用。立法、行政、司法不过是公共权力运用的另一种表述而已。

权力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公共权力是如何产生的?国家权力是怎样出现的?本来应属于每个社会公民的权力又是怎样落入少数人之手的?千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似乎成为一个千

^① 参见刘德厚:《重视“广义政治”理论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古之谜。尽管也有人对这个千古之谜做过各种猜测和解释,但由于他们没有一种解开这个谜的科学方法,因而那些猜测和解释总免不了落入俗套,往往是非科学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找到了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钥匙,拨开了罩在这些问题上的层层迷雾,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权力的出现和存在,自有它不可代替的功用。权力不同于权利。权利表明,一个人具有做某种事的资格。投票权是公民的一种民主权利,表明公民具有参与政治投票活动的资格。而权力则不同,它是一种力量,是组织对个人或某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力。公共权力是一种公共的力量,是公共组织控制社会和个人力量。这种公共组织往往表现为政府、政党和社会团体等等。然而,公共权力对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往往是通过个人实现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权力有时候也可能以某个个人的权力出现。个人在掌握了有关公共权力后,他或她可能用这种权力为社会谋幸福,也可能滥用这种权力谋私利,以求个人幸福。但是,公共权力就其本质而言,其功用在于谋取公共福利。管理众人之事和调控社会利益关系,应该是公共权力的基本功用。当然,在阶级社会里,这个“众人之事”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之事”,社会利益也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由于公共权力与掌握这种权力的个人、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利益关系,因而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总是

试图谋取或控制公共权力,并运用这种权力实现特定的利益。然而权力的获取有待于选择一种有利的途径,权力的运用则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

由于权力可以给个人带来实际利益,因而权力的滥用总是难以避免。如果权力受不到有效的制约,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往往就会滥用权力,这几乎成了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医治的一种“权力病”。为治好这种“权力病”,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些政治学家对此开出过“药方”。近代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所开的“分权制衡”的“药方”,对其后世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病”的防治有过很大的影响。现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一般都建立了一种“三权分立”的机制,其目的就在于防止“权力病”的泛滥。然而,几百年的实践证明,孟氏的“药方”顶多能起一种“止痛剂”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还权于民,其宗旨在于从根本上医治这种“权力病”,但理想离现实还有相当距离。

现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都是一种政党政治。公共权力的获取和运用都是通过政党来实现的。因此,政党成了公共权力角逐的主角。政党并非从来就有,它是资本主义政治的产物。任何政党都是一个谋求阶级利益的组织。当然,在一个阶级内部也可能出现多个政党。多党制是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每隔几年一次的选举,实际上是各政党对公共权力的轮番争夺。

竞选的场合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共权力争夺的场所。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国家的主要公共权力,在权力的运用中起着领导作用。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民主是人类的理想,也是几代中国人的渴求。民主意味着公共权力归人民所有,由人民运用自己的权力来为自己造福。“为民作主”不是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官主”;“以民为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资产阶级为了推翻封建专制主义,举起“民主”的旗帜,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仅仅是“钱主”,即“以金钱为主”、“以资产阶级为主”。人民最多只是获得形式上的“权力”,而并未获得事实上的“权力”,国家权力被牢牢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事实上为金钱所控制。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成了一种金钱与财富的游戏。社会主义国家请来了真正的平民“德先生”,使全部国家权力归人民所有,并为人民参与国家权力的运用提供了广泛的途径。但是,由于民主政治建设受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一个渐进过程。

权力的运用要达到其目的,非有一定的策略不可。历代剥削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往往把权力运用的策略视为一种权术,马基雅维里告诉当时的统治者,运用权力要像狮子一样凶猛,要像狐狸一样狡猾。这赤裸裸地暴露出剥削阶级权力运用的实质。

在现代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一些思想家们力图从理性中寻找权力运用的策略,把权力运用的过程描述为一个理性行为过程,企图为权力运用找到一个最佳方案。但大量的事实证明,在权力运用过程中,理性策略也会失灵。于是,人们在运用权力时,不再幻想“最佳”效果,只求“满意”就行。权力的运用意味着要应付各种局面,因而必须寻找各种应付局面的策略。成功的策略并不是排斥理性,而是要把各种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

权力的运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有序的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权力运用者应善于捕捉各种问题,学会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发挥智囊的作用,倾听各种不同意见,但决策大权必须自己掌握。正确决策是权力运用成功的关键,而组织和执行也决不是可以掉以轻心的。一步一个脚印,权力运用必能成功。

时代在发展,公共权力也在发展。当代世界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主要特征的世界,在公共权力的各种权力要素中,经济权力正在日益增长,在对社会 and 个人的控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日益现代化,政治权力系统也在不断现代化。公共权力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实现这种变革的战略应以渐变战略为宜。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公共权力总是表现为一种国家权力。诚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人类

终将会走向无阶级社会。到那时,公共权力依然存在,但不再表现为国家权力,而是成为一种真正的为民所有的公共权力,这就是人类未来的公共权力。